

析论《史记·五帝本纪》的大一统观—— 以空间叙事为视角

Grand Unity in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Excerpted from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A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Narrative

曹利娟*
(CAO Lijuan)

徐威雄**
(SER Wue Hiong)

摘要

中国传统叙事具有鲜明的空间特性。上述轩辕、下迄太初的著名史书——《史记》在多篇传记中从空间维度彰显了历史悠久、亘古不息的“大一统”观。《五帝本纪》作为正史之开篇，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三个方面暗蕴着肇始于五帝时期的浓厚的大一统思想。地理疆域大一统体现在五帝时期大体以“南—北—西—东”为位移路线，先后形成四个相应不同的活动中心，并向四界辐射，最终确立为“九州—四海”的内外空间概念。社会空间大一统体现为“聚”、“邑”、“都”各级部落的产生，其原因或是政治权力集中运作的客观需要，或是德化归附、社会生产实践的主动诉求。政治空间大一统体现在早期部落“夷”、“夏”民族身份的动态建构，“夏”居中、德为优，而“夷蛮戎狄”在空间上远离主体部族，但在功能上为主体部族抵御魑魅，诸夏对四海蛮夷的教化也采取“五服三就”、“五度三居”等空间化手段，由此达到空间与政治基于共同规划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夷夏各民族的大一统。

关键词：五帝本纪、大一统、空间、叙事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s have distinc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famous historical book,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mentioned above, demonstrated the long-standing and everlasting concept of “grand unification”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many biographies. “The Basic Annals of the Five Emperors”, as the opening chapter of official history, contains a strong idea of grand unification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Five Emperors perio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political space. The grand unification of geographical territory wa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during the Five Emperors period, the displacement route was generally “south-north-west-east”, and four

* 曹利娟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caolijuan166@163.com

** 徐威雄博士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专业高级讲师。电邮地址：wuehiong@upm.edu.my

corresponding different activity centres were formed successively, radiating to the four realms,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a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ce concept of “nine states-four seas”. The grand unification of social space was reflected in the emergence of tribes at all levels of “Ju” (*cluster*), “Yi” (*town*) and “Du” (*city*), which was either the objective need for the centralized ope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or the active demand for moraliz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on practice.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political space is reflected in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the ethnic identities of the early tribal “Yi” (*the barbarians*) and “Xia” (*the civilized*). The “Xia” is in the centre and has superior virtue, while the “Yi, Man, Rong, Di” (*barbarians of four quarters*) are spatially far away from the main tribes, but functionally serve the main tribes to resist evil spirits. The “Xia” also adopted spatial means such as “five mournings and three acceptances” and “five degrees and three residences” to educate the barbarians in the world, thereby achieving a harmonious unity of space and politics based on common planning, and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grand unification of the “Yi” and “Xia” ethnic groups.

Keywords: “Biographic Sketches of Five Emperors”, grand unity, space, narrative

前言

太史公司马迁谨承其父司马谈之遗愿，继太史世家，赓续祖业，“述往事，思来者”，以绍明世，继《春秋》。《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其旨数千”，被称“义海”。司马迁一脉承之，所著《史记》，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篇旨甚众，多有可发微之处。若说《春秋》乃“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史记》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言”之物，或被称为讽谏，劝喻汉武；或惩恶扬善，歌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又或承袭经部血统，成“百王大法”（阮芝生2022：9），垂法后王。正如《论六家要旨》借论学而论治，《史记》借述史而论治，申明治道，以达制治之原。司马迁生逢盛世，“大一统”观或隐或显其史著中。本文仅从《史记》之大一统观切入，以首传《五帝本纪》为例，从空间叙事视角深入论证分析，探索史公如何从空间维度建构百王之法、绵延千秋的治国治政之道——“大一统”。

《五帝本纪》关于黄帝的记述大体上引用了《大戴礼记·五帝德》，但不采“黄帝乘龙”说，并参考《尚书·吕刑》；黄帝之后的颡项和帝啻，记述全面引用了《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大戴礼记·帝系》；关于尧的内容，一部分引用自《五帝德》，但大体上全面出自《尚书·尧典》；舜的故事多取自诸子文章，兼采《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八年》、《尚书·舜典》，重叙事胜于抽象赞美（大野圭介，2006）。但《五帝本纪》非仅记五帝的历史，而是藉五帝事迹而梳理上古中国政教之所源，包括了天地山川、岁时日月、礼乐制度、设官分职等大经大法。五帝中又以黄帝为首，作为历史之开端，必有其寓意作旨。综合学者看法，不外乎四种意见：一是黄帝作为所有古代帝王的祖先，兼备了尧的最高神格和舜的英雄性格（大野圭介，2006），始创帝王典范；二是黄帝观兵、疆理、设官、定历、治气、艺种，首创治天下大法；三是将《五帝本纪》与《论六家要旨》、《史记·封禅书》和司马相如的《封禅书》并读，可领太史

公假黄帝德政讽谏汉武“少私寡欲”、“先定其神”之深心宏识（阮芝生2022：363）；四是为中国之“大一统”正本溯源，《五帝本纪》“著意于黄帝灭蚩尤，统一华夏，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置黄帝于五帝之首，正是‘大一统’的观念使然。”（林立仁，2009）。由此可见，《五帝本纪》文微义显且众，为专一隅而深凿，本文仅从大一统视角解读之，且以黄帝为核心，兼论尧舜，略及颛顼、帝喾。

何为大一统？这是出自《春秋公羊传》的核心概念。《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言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¹。学者刘家和（2005：369-384）曾在〈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一文中，从《说文解字》“纪”和“统”切入，继而对《春秋》、《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春秋公羊解诂》中“大一统”的内涵演变做过十分详细的梳理。按段玉裁所注，“统”引申有纲纪之意，但“纪”乃一丝之头，而“统”是许多丝的头，意即抓住许多根丝的头，这一团丝就能理出头绪了。析而言之，只有“统”才有“一”的问题。此“一”既是动词（to unite），也是名词（unity），因而有“合多为一”之意。但此“一”又非简单地“合多为一”，而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这是理解公羊学“大一统”的基本起点。《公羊》大一统说乃溯源于“元”，体现了“治空间中为一体性与时间中的连续性于一炉的大一统思想”²（刘家和2005：378）。何休在解诂《公羊传》时进一步把空间中的一统理解为时间中历史发展的趋势或结果。他还认为空间中的一统不能靠武力或其他东西，而只能靠仁心与仁政之不断地外推。因此，能实现大一统的王者必须是能推己以及人、正己而正人的仁者。也就是说，大一统并不以种族原则为依归，也不以地理疆界为标志，而是以儒家之义为取舍。在统一发展的进程中，中心可以有转移，王朝可以有更替，国土可以有增减，但一统之趋势不变。因此，“一统”是一种理念，是一套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价值体系，是方法论的“使然”；而“一统”最优结果是“统一”，“统一”是事实层面的“成然”。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更说过他著史是为了接孔子，“继《春秋》”（《太史公自序》），这个《春秋》实指董氏所传的《春秋》（阮芝生，1999）。据此，《春秋》“大一统”无疑将构成他史观与史论中的核心部分，并显山露水地穿插在本纪、十表、八书、世家、列传各项体例中。《五帝本纪》记叙黄帝时“万国和”、帝颛顼时“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时“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尧时“合和万国”、帝舜时细化中央权力的管理机构，帝舜因此成为五帝以来大一统国家构建成就的集大成者（杨燕起，2015）。《夏本纪》体现了一种刻意强调天下一统、凝聚

¹ 李学勤主编，1999，《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卷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9-10。

² 如《繁露·二端》云：“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具正，而化大行。”化大行则天下之统一矣。刘家和认为，当董仲舒把一统说从“王正月”追溯到“元”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一统”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统一性。这种治空间中为一体性与时间中的连续性于一炉的大一统思想，正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大特点，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至为重大，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所罕见。

人心的历史意识，其九州叙事大致符合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域内版图，“华夏九州”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自我生活空间的一种独特表述（陈正宏2020：31）。《周本纪》关于分封诸侯、捍卫中央天子、制礼作乐的叙述构建了中华大一统事业推进行程中的第一轮波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实现了古代中国社会又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统一。十表并时异世，尊崇黄帝德政，捍卫周天子权威，展现秦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过程，记录汉王朝不断通过中央集权加强大一统的过程。八书彰显了国家政权统一后在典章制度及社会文化方面的高阶性一统。三十世家则“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太史公自序》）。七十列传详列忠义之士、诸子群臣等许许多多奔义践仁的事迹，意在统系群生于一个最高核心思想之下。可见，《史记》的体例结构打破了传统史书的书写范式，凡符合疆域、社会政治以及文教归同的“大一统”史实与思想，太史公均将其纳入撰著体系中。

历史是真实的，也是建构的。史公勾勒的时间轴使人看清“大一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绘制的空间轴让人看懂“大一统”的本质和内在关联。《史记》在空间的轴线上讲述了中国的大风水，陈说了山川地理形态涵育的各地风俗民情，描述了不同历史阶段渐次形成的地域中国、民族中国和文化中国（韩昇2023：31、469）。有学者认为，“大一统”本就内在地包含了自然地域、文化构建、民族身份等方面的“一统”（徐军义，2014）。《五帝本纪》蕴有大一统之义，多有学者论述³，此处不再详文引证。本文进一步结合传统文献与现代研究，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分析《五帝本纪》里的三个空间维度，即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中的“大一统”观。地理空间表现为中心的确立与四方的界定；社会空间表现为“聚”、“邑”、“都”等早期聚落的初步形成；政治空间表现为从“夷夏不分”到“夷夏有别”、再到“夷夏一体”的民族身份动态建构。从分析可知，太史公透过这三个空间构建起中国一统的历史开端，也即是以黄帝作为华夏历史开章的主要意义所在。

一、地理空间：中心与四方

尽管历史的结构已经被简化成了一种时间性的“链条”，它们似乎与空间、场所、地方这样的概念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是在古代社会，人们心目中的历史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脱离了特定场所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基本构成材料的历史事件首先是空间性的，它们总是和一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龙迪勇2015：61）。如太史公在叙述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没有忽视标志国土疆域范围的地理空间观念的叙述。《秦始皇本纪》载，“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⁴。其后七年，又“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

³ 如孙庆伟〈《史记·五帝本纪》反映的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2024）、刘彦青〈重组的艺术与重构的记忆：《五帝本纪》黄帝战争文本蠡测〉（2021）、林立仁〈论《史记·五帝本纪》首黄帝之意义〉（2009）等。

⁴ 请参阅：司马迁，1959，《史记》，第一卷，秦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页239。文中所引述《史记》原文皆出自本书，不再一一注明。

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如此详实的地理载述，不可不谓史公心中有着清晰的地域空间概念。张大可（2022）进而认为，太史公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⁵，使其升华出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太史公确在《五帝本纪》的论赞中提及“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种由实地探访而升腾的地理“一统”思想反映至本传的著述中。五帝的活动场所相继有南、北、西、东四个中心，恰如鼎之四足，每一个中心又因权力、制度、仁政等作用，深深影响周边民族区域，从而初步形成了地理一统的历史空间观。

《五帝本纪》将黄帝塑造成中华正史第一人物，凝炼成虚实之间形象，尊崇为帝王样板，供奉为华夏始祖（李凭，2015）。关于黄帝的生息范围，《五帝本纪》沿用《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家语·五帝德》的说法：“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又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黄帝的生息范围应从“少典之子”和“轩辕之丘”二词眼切入。关于“少典之子”，不少学者已经明确认为“少典”乃部落名称⁶，但目前诸学者对该部落的大概位置莫衷一是；《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居轩辕之丘”，很有以地名唤人名的意味，考察“轩辕之丘”之所在，便能知晓黄帝的主要活动范围。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2001：52）中认为：

轩辕之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县西北，即古有熊氏地也。郡国志：“河南尹新郑，黄帝之所都。”通典：“新郑，祝融之墟。”今新郑县城东南二十里有黄水，下流与洧水合。左襄二十八，郑伯有迁劳鲁公于黄崖，杜预曰黄崖以黄水而名。水经注：“黄水出太山南黄泉。”太山在新郑县西北二十五里，一名自然山。“自然”即“有熊”字譌。然则称黄帝，以其居黄水得名。又新郑县西南四十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庄子：“黄帝将见大隗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而七圣皆迷”，是也。

郭声波（2020：67）编纂的《史记地名族名词典》也认为：“有熊，部族名。姬姓。相传上古时首领黄帝曾任华夏部落联盟首长。居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部、郑州市西部一带。其后黄帝之裔居轩辕，别称轩辕氏。”刘如江（2002）更在其《轩辕黄帝出生在新郑》一文从轩辕丘、黄帝遗迹及黄帝族的对外交往三个方面专论探讨黄帝生活

⁵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⁶ 关于少典的说法，南朝宋裴驥《史记集解》解释：“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中国民俗史研究专家吉成名在《论黄帝身世和姓名》（2017）一文中对此二种说法均予以反驳：“少典”既非人名，亦非诸侯国号，而是司空季子给黄帝部落所取的名称，是编造出来的说法，暂且应理解为部落名称。他认为，“少典氏”就是缺少文献典籍的部落，这个称呼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社会发展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宋罗泌所撰《路史·国名记》认为“少典，有熊之开国，今郑之新郑。”（见《路史》卷二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浙江大学图书馆影印古籍。）郭声波在《史记地名族名词典》（2020：28）把“少典”这一词条解释为：部族名，相传居今河南省新郑市、许昌市一带。

地，并得出结论“黄帝族决不可能在黄土高原或河北涿鹿，更不可能在昆仑山，只能在河南新郑一带。”本文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发现以及文化遗迹、故居遗址⁷，亦从以上说法，认为黄帝初期主要的活动范围大体应在今河南新郑周边。不过，随着黄帝统一步伐的迈进，其活动中心渐向北移。

黄帝之时，神农世衰，诸侯暴虐，侵袭百姓，天下无共主而大乱，黄帝乃修德振兵，习用干戈，逐渐统率各方部落，名曰“教熊羆貔貅虎”，战炎帝于阪泉之野，收蚩尤于涿鹿之野。“阪泉”、“涿鹿”二字点明了黄帝主要战事的活动空间，这与黄帝后来“邑于涿鹿之阿”遥相呼应。关于二址地望所在，《正义》曰：“涿鹿，山名，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⁸《读史方輿纪要》载，涿鹿城，汉县属上谷郡，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望⁹。太史公在访古旅行中特意采访故地“西至空桐，北过涿鹿”，涿鹿显然指的是汉上谷郡涿鹿县¹⁰。王北辰通过对历代史籍的详细考证、沿革梳理和实地考察后确认（见图1），汉代设有涿鹿县，今河北省涿鹿县城（隶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还保存有古城垣的残迹，涿鹿古城和阪泉水在其矾山镇，合符之地釜山则是其保岱镇窑子头村北面的一山（王北辰，1994）。综而观之，可以见出，黄帝先是“居轩辕之丘”，后又“邑于涿鹿之阿”，活动中心渐次北移。

之后，黄帝子孙承延帝祚，“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史记·五帝本纪》）活动范围渐移“江水”、“若水”一带。关于其地望，《水经注》有言：“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南过越巂邛都县（笔者注：今四川西昌市）西，直南至会无县，淹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又东北至犍道县，入于江。”¹¹钱穆（2001：52）在《史记地名考》中引《索隐》：“江水、若水皆在蜀”。龙显昭（2010）在《颛顼出生地及相关史迹考论》一文也有详细考证：

江水，在明以前例指长江，并且认为江水的源头就是岷江。《尚书·禹贡》说：“岷山导江。”《荀子·子道》说：“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说：“江出岷岭，其始滥觞。”可见，在徐霞客写《江源考》之前，文献里的“江水”所指，就是今天四川的岷

⁷ 关于黄帝的故乡，学术界存在河南新郑、陕西黄陵、山东寿丘、甘肃天水、湖南长沙等不同说法，其中陕西黄帝陵和河南黄帝故里最受认可和关注。

⁸ 司马迁，1959，《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页7。

⁹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七，北直八，页25。关于涿鹿城词条，原文无标点词条如下：涿鹿城在州西南汉县属上谷郡应劭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望世纪云黄帝所都也汉置县后汉因之晋属广宁郡义熙十一年魏主嗣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广宁是也后魏亦属广宁郡后废魏土地记下洛县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二十里有大宁城又轩辕城在州东南四十里相传黄帝所筑今名古城。

¹⁰ 战国时期，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请参阅《史记·匈奴列传》。

¹¹ 《四部丛刊初编》，水经注卷三十三，景上海涵芬楼藏武英殿聚珍版本，页117。

江。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若水，即今雅砻江，长约1500公里，为金沙江第一大支流，由北而南穿行于川西山谷之间，至攀枝花市三堆子注入金沙江。蒙文通、方国域先生亦认为，古之若水就是今雅砻江，下游名打冲河，与金沙江合流而下，至宜宾与岷江相会。据诸家考证表明，若水的方位也是在四川的西部，可谓众口无异词。至于蜀山氏，其地望亦当在西蜀山区。据《益州记》云：“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曰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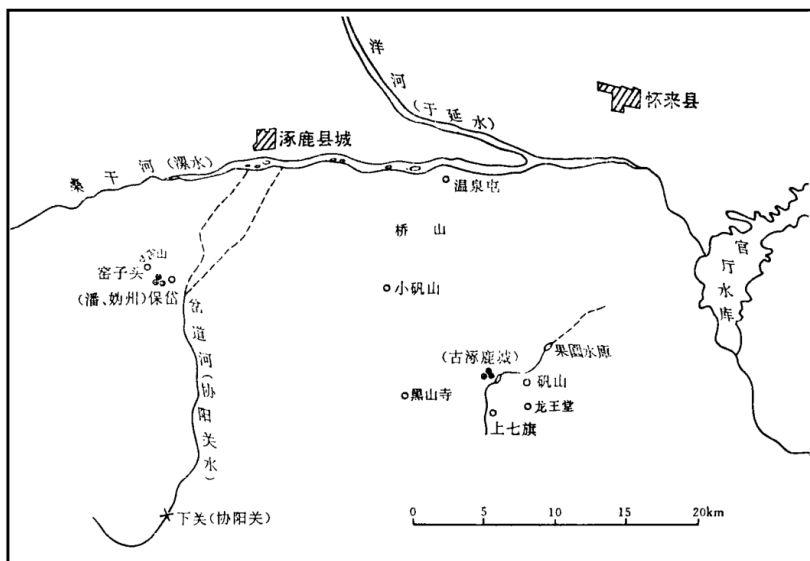


图1：古涿鹿城址（王北辰，1994）

神话传说中太阳栖息一对神树，“东极扶桑，西极若木”，看来蜀之若水自西方若木出，大概是吻合的。此时，华夏远祖的活动中心向西部即今四川省位移。

至五帝最后一位的虞舜时，活动中心又渐向东部转移。“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史记·五帝本纪》）顾颉刚（2005：96）在《尚书校释译论》中认为：

“虞”，王肃但说是地名，皇甫谧说是河东大阳山西虞地，黄度说是解州安邑县（皆《彙纂》引）。薛氏本则说是河东虞乡，为舜始封。这都是指春秋时晋假道于虞以伐虢之虞。皆指今山西境。其更早的虞是《诗·緜》“虞芮质厥成”的虞，当周文王时，其地为古吴岳之地。“吴”即“虞”（省虎），亦即四岳之地。在今陕西境。然这都是周代时所称之地。《尧典》所称舜之“虞”，远在周之前。《孔疏》称“舜居虞地，以虞为氏”，

所以才称“虞舜”。《孟子·离娄下》说舜“东夷之人也”，则他所居地不会跑到山西、陕西去。所以当是至今尚有遗称的河南省东部虞城县附近，其地邻近山东。一些有关历史传说中舜的活动地点如诸冯（菏泽南）……，大都在今山东省西部，少数在今河南东部，都和虞城相去不远。即可证这“东夷之人”的舜所居的虞地在今河南东部，因而其活动所及之地至于今山东西部。

顾颉刚还认为，妫水，旧误释在山西境，已知虞在今河南东部，作为舜的后代妫满所封陈国（见《史记·陈杞世家》）也在虞城西南，知妫水必指河南东部虞城西南附近的一条水。由此可见，舜帝的主要活动中心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

至此，五帝时期的主要活动中心位移情况已大体明了，即从今天的河南转向河北，再到四川、山东，形成南—北—西—东的位移路线。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止部》¹²说：“历，过也”。“过”就是指空间上的移动。“历史”的形成就是空间不断切换的过程。可以想象，作为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领，五帝所及之处都播撒着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文明的种子，每一个中心作为一个辐射点，深刻影响周边区域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共同点燃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为地理空间的大一统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渐进和复杂的过程，太史公在为五帝作传时不仅明确了原初文明的中心点及其位移情况，也清晰地“绘制”了不同时期“四至”的边界轮廓。诚如韦斯特法尔所说（Bertrand Westphal 2011: x），所有的写作都以一种制图的形式参与，因为即使是最现实的地图也不能真实地描绘空间，而是像文学一样，以一种复杂的想象关系来描绘它。现将五帝时期的行迹边界整理如下：

表1：五帝时期的行迹边界¹³

五帝	东	西	南	北
黄帝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	西至于空桐，登鸡头。	南至于江，登熊、湘。	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帝颛顼	东至于蟠木	西至于流沙	南至于交阯	北至于幽陵
帝喾	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尧	殪鯀于羽山，以变东夷	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放讎兜于崇山，以变南蛮	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帝舜	东长、鸟夷	西戎、析枝、渠廋、氐、羌	南抚交阯、北发	北山戎、发、息慎

¹² [汉]许慎，2007，《说文解字》，[宋]徐铉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74。

¹³ 不过顾颉刚对本传中“四至”颇有异议，他认为，春秋以前人们只有种族观念，并无地理空间上的一统观念，而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顾颉刚，2010，〈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页200-204。）

此表可见，太史公叙史有极强的四方空间疆域意识。黄帝的活动范围东至海域，西登甘肃高山，南临长江，北接匈奴；帝颡项时东至东海仙山，西及张掖荒漠，南迄两广，北抵幽州。两相对比，可以见出，颡项为帝后并没有固守前此疆域，而是在前此疆域基础上作了或多或少的拓展，其中拓展范围最大的是南部疆域，由原来的长江流域拓展至交趾（今两广地区）一带，拓展范围最少的是北部疆域，由原来的黄河流域拓展至华北平原北侧。如果说黄帝大体上在黄河与长江流域间构筑了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那么颡项大体上在蒙古高原与南中国海、西部流沙与东部沿海间架构起古代中国的辽阔疆域。自此而后，古代中国随着朝代变迁，即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依托，向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或是扩大或是缩小，其疆域的大框架大体保持不变（蔡亚玮2018：26）。

如果说黄帝与颡项在位时是以地理位置分割空间的话，那么帝尧和帝舜时的空间拓殖则具有明显的民族化特征。帝尧时，四界表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帝舜时民族类别的表述更加明确具体，如“氏”、“羌”、“息慎”等。这表明了太史公的空间认知和疆域观念：地理边限不是划分空间的唯一标志，疆域边界（空间）是伴随着对边远部落（人物）的深入了解而不断变化的，于是出现了“四海”的说法，《正义》注曰，“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¹⁴

至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史记·夏本纪》）在夏禹时期，不仅有了四至，而且已经能将其声教所及的不同程度划分为五种具有鲜明空间意识的区域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各服内又划分为二至三个甚至是五个不等的，总共为十四个不同的层次。杨燕起（1996：35）认为，夏代大约是形成稳定的“中国”这个四至范围的重要时期，在商、周以后的时代也就再没有这样明确的提及了；在太史公看来，领土范围的概念随着国家的产生也就同时出现了，而且是组成国家意识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人物史，也是国家地域史，因此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格外重视四方疆域的地理空间叙述。不过按照杨燕起的说法进而分析，自商以后，人们对“中国疆域”有了全新的认知和经验，即中国进入了民族融合、因而难以通过四至范围来划定国土边界的时期，国家的概念渐渐演变为包含着“畿服”¹⁵制度或理念的“天下一统”观念，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确证。

第一，与商周时期的疆域类型不同，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通过“四至”描绘了五帝时期“南”、“北”、“西”、“东”四点式疆域。许倬云（2015：39-41）在《说中国》一书中认为商朝的疆域类型是同心圆式、周朝为椭圆形：

¹⁴ 司马迁，1959，《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页44。

¹⁵ 先秦时期的“畿服”制度或理念存在《尚书·禹贡》的“五服说”与《周礼·职方》的“九服说”。“五服说”天下方五千里，中国方三千里；“九服说”天下方万里，中国方六千里。从“五服”到“九服”的变化，反映了古人疆域观念的扩大。（顾颉刚，2011，〈畿服〉，顾洪编，《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页265-280。）

商王国并不是直接治理各地，商王国首都被称为“大邑商”，在首都的外围有许多子姓的王族，即所谓“多子族”，他们拱卫都邑。有的王后自己也率领部下，居住在都城四周的某一处。在其四周则有商人的城邑，由王国的使者负责监督；再外面，则是商人友邦；最外圈，是一些称为“方”的族群国家，例如土方、人方等。周人则把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作为当时周邦实质的统治者，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往返于两地之间。

疆域类型由五帝时期的方形转变为商时的同心圆形、周时的椭圆形（见图2），国家的概念得以延展，边界得以模糊，大一统的地理空间观念因此更具有包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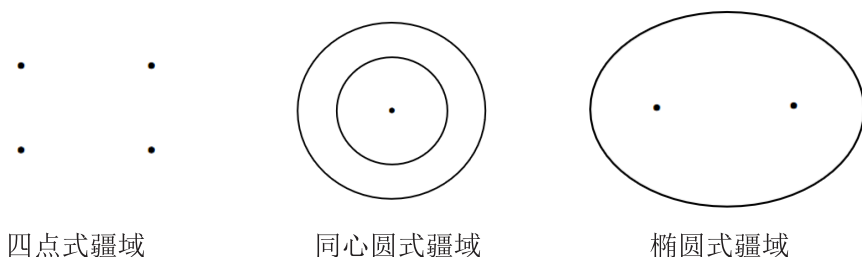


图2：五帝、商、周时期的疆域类型

第二，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关于“九州”与“四海”的说法为之后历史上“中国”概念的分化奠定了基石，即地域的中国和文化、政治一体化的中国；前者以“禹迹图”为代表；后者则以“海内华夷图”为代表。“禹迹”，顾名思义，即是大禹通过“刊旅”（刊木以通道）、“浹原”（疏水以通流）等划定九州而走过的地方。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与《夏本纪》中援引《尚书》以“九州”指称最早的疆土分野。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绘制的“禹迹图”所描述的疆域，基本上相当于太史公“九州”等概念所指的版图，即长城以南、横断山以东广袤的东亚大陆。林岗（2010）将此范围称作“本部中国”，并认为“秦汉以前诸夏人的人文活动是在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本部中国’的疆域范围内展开的。历经数千年，这种活动的地理政治成果就是‘九州’观念的形成与沉积。”九州或“本部中国”的空间观得以确立，不过空间仍在继续延展。秦汉以后，诸夏人不得不在一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生存，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的周边民族发生冲突、融合，由此发育了“周边中国”的概念（林岗，2010）。“周边中国”即是核心区域除外的广阔地带，是中国疆域的周边区域。唐代贾耽绘制“海内华夷图”即包含“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十分契合太史公“声教讫于四海”的说法。《旧唐书·贾耽传》提

到,“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¹⁶“七戎”、“六狄”都将是声教所至、礼仪所及的地方,当下是“夷”,将来也许是“夏”,教化是“夷”、“夏”两大空间转化的重要桥梁。“夷”、“夏”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海内”,“海内”的疆域观念渐渐有“天下一统”的深意了。

顾炎武言,“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¹⁷《五帝本纪》中大量清晰的方位表述同样表明太史公在写作时对山川地理、战场居所了然胸中,若非如此,便不能以文字的形式绘制出这一巨幅远古历史地图。如果说年表强调历史的时间性,那么历史地图则强调历史要素的空间性;历史地图起到的作用,就是把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形势都放入一个空间范围内,放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直观地反映历史(葛剑雄、周筱赟 2002: 97)。阅读《五帝本纪》时,读者跟随太史公“历史地图”的绘笔追溯中国文化的发源历程,即东西贯穿整个黄河中下游平原,南及气候和水土优越的淮河、长江流域,以及得天独厚的四川盆地,北达荤粥(匈奴)边界,后又广延至华南、西南、东北、漠南等各少数民族聚居一带。

太史公传述五帝所传达的“中心——四方”空间观与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或有关系。汉武帝时代首次开拓了北绝大漠、西愈葱岭、南至南海、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每一次疆域开拓的战争或博弈,都是一个不断了解其他民族并与之交融的过程。同时代的太史公日浸其中,一方面培养了鲜明地理空间意识,另一方面强化了夷夏互融意识。这些在《五帝本纪》以及其他篇目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如《夏本纪》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载地理,对禹治九州及其区划,对王侯所在城市与城外围、郊区、边远地区间的关系,对由地理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些制度,都进行了总结(阎崇东 2005: 310-317)。太史公以五帝的活动空间为核心构建的“四点式”民族地缘共同体,不仅为中华民族勾勒了“共同的地域”,也成为早期华夏人“天下一统”意识的共同空间范围。

二、社会空间：聚落的形成

太史公早已发现,各民族人民之间越来越频繁、紧密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逐步促成了社会空间的“大一统”(张大可, 2022)。《货殖列传》对此有如下生动的记载。秦统一六国,迁山东豪强卓氏、程郑于边邑,居于临邛,卓氏、程郑从中原带来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临邛冶铸铁器,运销椎髻之民,有力地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蜀生产的扈、姜、丹沙、铜、铁、竹、木器等产品,大受中原民众的欢迎;同样,中原也需要来自民族地区的特产、畜产,例如从南夷僇族、昆明族输入的木棉褐布就是当时的畅销货;“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唐蒙,出使南越时在番禺

¹⁶ 刘昫, 1975,《旧唐书》(全16册),第十二卷,传六,北京:中华书局,页3785。

¹⁷ 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通鉴兵事》条,页1。

（今广州）见到了蜀地产品枸酱，回到长安后才从蜀人商贾中得知，这种酱是通过夜郎辗转进入南越，加强了巴蜀与夜郎、滇等地的往来沟通。《平准书》也提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国家的统一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无限繁荣，而社会层面的“大一统”离不开空间维度的不断整合，这就需要从最远古的部落说起。

中华远古聚落的生成可谓是中华文明之曙光，开拓了华夏文化的端源。鲁西奇（2014：409）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一书中提到，早期聚落的生成有多种形态¹⁸，其中一曰政治权力集中运作的需要，二曰社会集聚的自然生成，这两种聚落形态都在本传中均有所揭示。不仅如此，贯穿《五帝本纪》的两条主线，即“大一统”和“尚德”思想（刘彦青，2021），也闪烁其中。

首先，黄帝通过“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貙、虎”而成功战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之后“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阿”特指三面环山的山下平阔地区。此即是说，黄帝首先施德政、获民心，然后联合“熊、黑、貔、貅、貙、虎”等各部落，在经历与炎帝、蚩尤、荤粥（即匈奴）的三大战事之后，在釜山¹⁹通过“合符”的仪式被各部族拥立为盟主。由此形成了以黄帝为首的大的部落联合体，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人文基础。这被一些学者称为是中国的前国家时期第一个酋邦的建立。所谓酋邦，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非部落联盟形式的部落联合体（王和 2011：7），它有三大特征：第一，酋邦产生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征服，而组成这种部落联合体的部落之间不一定具有血缘渊源；第二，酋邦内各部落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臣属关系；第三，酋邦是具有明确的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王和 2011：12-13）。显然，黄帝为首的部落联合体具备酋邦的此三大特征。黄帝命各部落邑于涿鹿之阿表明，中国最早的聚落形成是政治权力的体现²⁰。这与鲁西奇（2014：407-408）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人类早期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与权力的生成、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在早期聚落的形成过程中，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独立而分散的个体或家庭集中起来，规定其集中居住在聚落中及其在聚落空间与聚落社会中的位置，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构成聚落的物质基础。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得到切实的体现，并在具体的空间范围中得以呈现出来，生成并建立起其基本架构，逐步形成为部落酋邦，进而产生了国

¹⁸ 鲁西奇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2014：409）书中认为，一个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是以集村为主，还是以散村为主，是人们在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过程中长期选择、不断适应与调整而逐步形成的，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环境（地形、洪水与气候等）、经济生产方式（农耕、采集与渔猎、伐木等）、政治权力及其运作、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乡村基层组织、宗族等）以及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因素都在共同发挥着作用。

¹⁹ 釜山，《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即今河北涿鹿县南桑干河南岸。见司马迁，1959，《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页7。

²⁰ 难怪乎不少学者认为，涿鹿乃中华文明之源。太史公司马迁也曾亲至涿鹿，探访黄帝与蚩尤战争遗迹。可参看周颖南，1996，〈中华文明始于涿鹿〉，《民主》，第11期，页40。崔勇、魏隽如，2012，〈炎黄文化的发祥地——“涿鹿”与“阪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5期，页21-24。

家。因此，集中居住，乃是政治权力对于民众居住方式的一种“原始要求”，权力集中与有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集中居住。这体现了权力空间对地域空间的支配，并由此促进诸如聚落等社会空间形式的生成。

《五帝本纪》在为五帝中的最后一位——帝舜——作传时，还描写了聚落生成的另一种方式，即自然生成。“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句微言大义，首先表明中国早期聚落的三种形态：集散成“聚”、聚多则“邑”、邑众则“都”。其次，如太史公所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太史公不言虞舜而言历山之人、雷泽上人、河滨之器，侧面说明舜帝影响深远的德育教化作用，因此“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淮南子·原道》对此论述精辟，“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犂墉，以封畔肥饶相让；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当此之时，口不设言，手不指麾，执玄德于心，而化驰若神。”²¹舜帝的德行影响力促成聚落的形成。因此，“聚”、“邑”、“都”可以是众民归德而自然形成的聚落形态。第三，农耕、渔猎、制陶远非一人之力可完成，人们之间社会协作的需求势必加速聚落的形成。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生产条件下，经济生产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超越家庭、自然村落和较小区域的协作需求，这种协作需求及其逐步扩大，是生产区域形成、组合并逐渐向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鲁西奇 2014：26）。更有学者甚至认为，“舜耕历山”不只是促进聚落的形成这么简单，而是标志着上古时期的社会结构开始由部落联盟走向国家政权，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陶寺遗址的发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多证据，因舜族对农耕文明的推广，使得历山能够广布大川，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国家体制得以在舜的时代开始建立（柴春椿 2021：29）。这表明虞舜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已不仅限于“聚”、“邑”的形态，甚已初步具备国家体制的雏形。

的确，多有文献记载五帝时期已有“都”的出现，“都”和“邑”之间的关系应是城与村落的关系。《礼记·祭法》说鯀“有功烈于民者”，《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²²；《吕氏春秋·君守》说“夏鯀作城”²³；《淮南子·原道》中说：“昔者夏鯀作九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²⁴都以鯀时作为始筑城的时间。《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将筑城时间提至黄帝时期。考古遗址是历史空间的直观再现，五帝时期约处于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上述文献记载的不误（王奇伟，2008），“迄今为止我国（笔者注：中国）已经发现50余座史前城址，它们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这些城址中以大溪文化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和仰韶文化的郑州西山古城址为最早，距今5000年左右。到龙山时代，城址开始大规模出现，遍地开花，城市内部已普遍出现规模较大的夯筑宫殿或宗庙基址。城址周围分布

²¹ 刘安，2009，《淮南子》，顾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页20。

²² 请参阅李学勤主编，1999，《礼记正义·下》，《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卷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1308。

²³ 鯀，即鯀。请参阅陆玖译注，2011，《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页584。

²⁴ 顾迁译注，2009，《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页12。

着一定数量的较小的聚落。城市的出现反映出这时的社会与以前社会已有较大的差别。”

五帝时“聚”、“邑”、“都”等或大或小的聚落的出现与发展是自然环境、政治权力、道德教化、经济生产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大一统”在社会层面的体现。聚落的形成一方面担负起分割物理空间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帮助先民们建立了原始的空间生产意识。空间生产的背后隐匿着政治权力、道德价值取向等文化政治关系。可以说，主动的社会空间探索与生产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标志之一。

三、政治空间：夷夏的分野

太史公描述“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是叙三代天子列国世家以及周边各民族，皆归本于“黄帝子孙”。如“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吴太伯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颡顼”（《楚世家》）、“越王勾践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匈奴列传》）。这可说是将汉武帝以前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重构，中国境内各民族皆“炎黄子孙”。二是记叙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郡县制度，如“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卫将军骠骑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列传》），“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东越列传》），“平南夷为牂柯郡”、“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犁郡，丹驩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西南夷列传》）。如此看来，依太史公所言，基于血缘脉系的家族制度和基于行政命令的国家制度才是实现各民族政治一统的可靠保证。这个观点在《五帝本纪》中也显现端倪。

中国商周以前之古史，实即一部古代民族史（徐中舒 1998：440）。恰如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五帝本纪》中说，“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 1986：325）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变革中，随着历朝历代民族观的变化，夷夏之间的博弈——相融或冲突——也不断反映在地域空间的变化。空间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空间布局的调整、空间的规划与建构表面上看是科学规律的结果，其实质都是利益关系的驱动（高季乔、李建华，2016）。作为《史记》的开篇传记，《五帝本纪》详细载述了远古帝王如何利用空间、距离、方向处理夷夏问题，逐步形成了从“夷夏不分”到“夷夏有别”、再到“夷夏一体”的民族身份动态建构，由此实现了民族大一统。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至西汉时此民族大一统意识已反映为具体明确的空间观，刘向的说法可谓是实证，“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²⁵。为洞知其灼见，需要首先分别对本传中“夏”、“夷”的形成过程来个剥茧抽丝。

²⁵ 请参看：卢元骏译注，1979，《说苑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612。前文已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九州又名神州、十二州，最早出现先于《尚书·禹贡》中，是我国汉族先民自古以来对中原地域的概念，自战国以来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中州，即中原，为古豫州地，居九州之中。

《五帝本纪》开篇敷陈黄帝战炎帝、擒蚩尤而成为部落联合体的首领，但并未区分何者为“夏”，何者为“夷”。首先，黄帝长成后娶西陵之女，生玄囂和昌意；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则高阳为黄帝之孙，是太史公五帝谱系中的第二帝颛顼。从黄帝娶西陵之女和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来看，黄帝时代与西部的民族交往频繁（王文光、翟国强，2005）。再看炎帝，炎帝为姜姓部族，即古分布于今甘、青地区的古羌族的分支。“羌”字从羊从人，“姜”字从羊从女，姜族、羌族应为与游牧相关的部族，其部族与黄帝族长期世通婚姻。最后谈谈蚩尤。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详列四条依据以证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而并无属于其他集团的可能性（徐旭生2003：57-62）。以上说明，炎帝乃西戎部落，蚩尤为东夷部落，黄帝部落与西戎、东夷等其他部族或战争或联姻。因此，这是一个只有部落的不同，而无夷夏之分的交流融合时期。各个部落原本生活在各自的空间，但是随着部落族群的扩大，身处西方的华夏部族不断向东部的中原地区发展，而处于东方的东夷族也向西边的中原地区扩张²⁶，终于到了距今约五千年的时代，展开了为争夺中原核心地带的激烈斗争，最终炎黄部族控制了中原的核心地区，东夷集团渐渐融入炎黄部族，至此，三大部落的地域空间得以打通，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得以实现。经过颛顼、帝喾时期的过渡，又经尧舜时期的德亲睦和、联姻、凝聚、举贤、任职等策略²⁷（见图3），亘古不息、熠熠生辉的“夏”主体民族由此形成。中国先民终于完成了“氏族→部落→部落联合体（酋邦）”的过渡，这似乎与太史公依据《尚书·尧典》所述的帝尧时期“九族→百姓→万国”逐步一统十分吻合。

酋邦或部落联合体成立之后，便是部落首领的人选问题了，这将决定哪个部落空间是权力的主导空间。事实上，“自炎、黄时代通过激烈的大规模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酋邦式的部落联合体之后，酋邦内部最高领导权的交接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机制，它保证了这种权力交接不必动辄采取激烈的外部冲突的形式，而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这正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智慧与技巧的早熟性。”“唐尧、虞舜、夏禹之间的权力继承并非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王和2011：48）。的确如此，《五帝本纪》在阪泉、涿鹿之战后，竟再无记述其他战事，专载五帝顺时象天、抚教万民、德泽延布的政治清明。

了解“夏”的形成过程之后，再来回溯一下“夷”是如何形成的。夷，从大从弓，会意，弓所持也，本指中国古代东部民族，后泛指中原以外各族。关于“夷”的说法，《五帝本纪》仅在尧舜时提及。黄帝传中只说“北逐荤粥”，并未为其挂上“蛮夷”的名号，这更印证了前述的黄帝时期只有部落之别、而无夷夏之分的观点了。

²⁶ 傅斯年（2012：66）认为，至三代时期，已明显存在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不过，有学者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持，后来李济论证了“夷夏东西说”，通过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方位关系进行考察，勾勒出了中华民族早期“多元一体”的关系格局（李如东，2023）。

²⁷ 这恰好印证了前文提出的观点：在太史公看来，基于血缘脉系的家族制度和基于行政命令的国家制度才是实现各民族政治一统的可靠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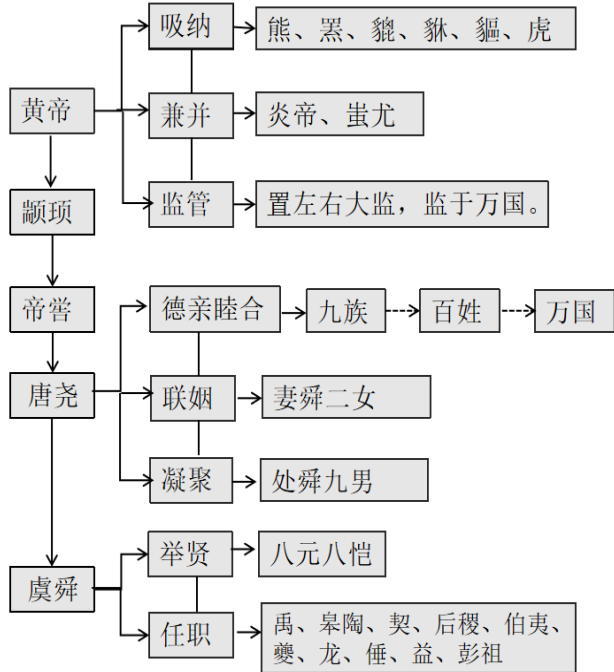


图3：五帝时期“夏”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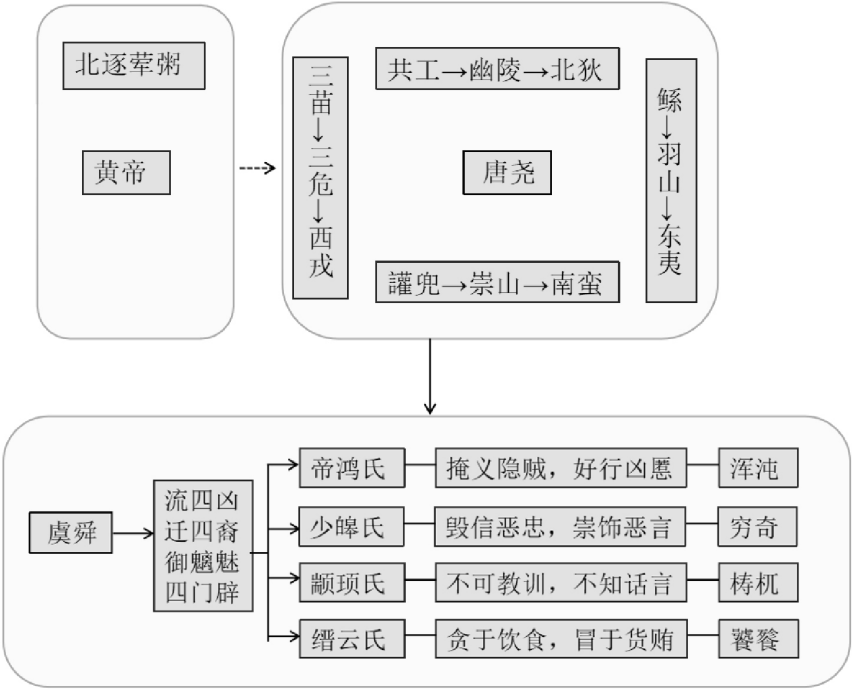


图4：五帝时期“夷”的形成

关于北狄和南蛮的形成（见图4），《五帝本纪》如此记述：尧传中两次提到“讙兜进言共工”，尧两次曰不可，之后任命共工“工师”，尝试统领百工制作。“共工果淫僻”，即共工不出意外地放纵作恶。帝尧许是明察秋毫，发现讙兜与共工二人（亦或是两个部落）已拉帮结党，便用权将二者流放一南一北，化为南蛮和北狄，分置两极，体现了权力对空间的支配，可以说是很有政治智慧了²⁸。

再来看西戎和东夷的形成过程。三苗原本常居南方，“《战国策》载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就是现在的鄱阳湖。左彭蠡，右洞庭，应该在湖南、江西的北部。”（徐旭生 2003：66）帝尧将本在南方的三苗部族异位迁徙至西北，变为西戎，使其远离常居熟悉之地，以防生恶。鲧，又称崇伯，崇即今河南嵩山，夏部族当时生活在嵩山周围地区，帝尧也将其异地流放，使其远离中部主族，居在今山东地区，以化东夷。

帝尧能将四罪流迁，也就说明四罪都在帝尧或者华夏族的管辖范围内，而讙兜、共工、鲧三者本就是尧之重臣，并曾被委以重任，如今被流放四地，化为蛮夷，可见“夷”本是由“诸夏”转变而成的。“夷夏不分”的融通空间自此被人为割裂，开启了“夷夏有别”的“中心与四方”的空间感受，久而久之，便储存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于是，“夏”和“夷”便好像“天然”地带上了空间差别的标签，一个居于“九州”，一个远在“四海”。

至帝舜时，迁四裔的四凶——浑沌、穷奇、檮杌、饕餮——分别是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和缙云氏的后代（见图4），也就是说此四凶本就是华夏族的后裔。“四裔”，《集解》引贾逵的说法是“去王城四千里”²⁹，也有学者认为是四方偏远荒凉之地、极远之境。但四凶即便在极境之地也是为华夏族所用的，即“抵御魑魅”，因此后文才说“于是四门辟，言毋无凶人也”。此描述体现出一种矛盾且模糊的观点，一方面四裔之凶要在空间上远离主体部族，但另一方面还要在功能上为主体部族担当某种使命，其角色是夏是夷难以分辨。前者强化了部族群体成员关于“夷夏有别”的空间意识，后者似乎又为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所提出的“华夷互变论”提供了某些余地，久之便有“夷夏一体”的说法。不过至此，“夷夏五方格局”已经形成，“夏”居中，“夷蛮戎狄”环于四周而被称“四海”，“华夏”与“夷蛮戎狄”共同生活，共同开发这片广袤天地，共同居于“天下”的地理空间之中，这也是华夏天子希望能统驭华夏于一体的地理空间（段超、高元武，2020）。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帝尧时流放的共工、讙兜、鲧或是因为履职能力较差，或是因为性格乖张暴戾，但帝舜时，浑沌、穷奇、檮杌、饕餮四凶已被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因此“夷”便不仅仅是客观的边远空间概念，还带有不合义礼、寡廉鲜耻的主

²⁸ 《五帝本纪》原文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求流放四者，也可说，终究是舜的政治智慧。不过究竟事实怎样，传说颇古，难以求证。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003：68）一书中认为，“放驩兜于崇山”的说法，似乎是因舜、禹南征的时候，讙兜氏族（笔者注：即讙兜氏族）畏惧兵威，暂避于今湖北或湖南西部高山里面的结果。至于“以变南夷”的说法，那是儒家思想“以夏变夷”的反映，太史公承用其说。

²⁹ 司马迁，1959，《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页38。

观概念。“华夏”应当以“文德”区别于“四夷”，应对归附的夷狄予以安抚（黄松筠，2019）。帝舜认为“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意思是四海蛮夷常到中原抢夺杀掠，内外贼寇猖獗。于是他任命皋陶为士，使用空间的手段加以处理。“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³⁰意思是，既服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当就三处，“三就，谓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³¹若君不忍刑，则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郑康成曰‘三处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远近若周之夷、镇、蕃也’”³²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文明之初，先人不断凭借空间意识解决“夷”的教化问题。空间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类摆脱了混沌的生活状态，而将自己的生存放在一个规则的、有条不紊的空间系统之中，放在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之中，使一切客体对象都能在这个系统中结构化、秩序化和伦理化（韩晓 2006：31）。空间与政治制度及社会伦理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空间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规划与布置，代表着秩序与稳定，而政治制度和伦理体系同样是一种规划与约定，空间与政教基于对世界的共同规划而达到了统一；因为空间与政治活动和伦理教化的诸多项目搭上关系，原本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则由此具有了浓厚的政治内涵和伦理意义（韩晓 2006：30）。“夷夏观”兼具了空间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夷”“夏”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因此不仅带有天然的空间想象，还具备文化、伦理殊异的特点。空间不仅是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即夷夏之别），还是问题解决的直接路径（即五服三就、五度三居）。帝舜“分北三苗”便是另一佐证。

在太史公看来，夷夏的形成过程天然地带有“夷夏有别”但同时“夷夏一体”的属性，如此客观的民族历史书写足以使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念认同上“成一家之言”。“夷夏之别”在地域、在德性；“夷夏一体”在于“夏”对“夷”的教化与吸引，“夷”对“夏”的向往与归顺。诚然，这其中自然受到西汉以前夷夏空间观的影响³³，例如“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³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³⁵此外还有陆贾“附远宁近，怀来万邦”的华夷远近论、贾谊的华夷上下论，以及董仲舒的华夷互变论。在太史公之后，历代华夷观依然带有明显的空间或

³⁰ 《尚书》作“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请参阅：[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2003，《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页65-66。

³¹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2003，《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页65。“同族适甸师氏”是指王室同姓或有爵位的罪犯，被送到甸师氏的地方，等待刑罚。甸师氏是指在郊野地区专设的负责执行王的同族或有爵位的贵族死刑的官吏。

³²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2003，《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页66。

³³ 孔孟以来，传统儒家主张的“以夏变夷”对太史公的夷夏空间流转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如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表明民族关系并非固化不变；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

³⁴ 《左传》，2012，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页1951。

³⁵ 《春秋公羊传》，2016，黄铭、曾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页504。

空间流变意识，并影响深远，例如北宋石介的华夷内外论，《大义觉迷录》的“一统论”³⁶。

结语

中国传统叙事逻辑彰显了鲜明的空间特性（王瑛，2016），《史记》展示了太史公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显在的空间思维。以《五帝本纪》为例，空间因素在《五帝本纪》中的客观表现，是毋庸置疑的（杨化剑，2020）。通过中心的确立与位移、四方疆域的明晰，太史公描绘了五帝时期地理空间的大一统；通过中华文明之初“聚”、“邑”、“都”各级部落的形成，太史公揭示了远古时期政治权力、道德价值对空间生产的支配和影响，叙述了早期部落社会空间的大一统；通过表层的九州为尊、四海会同的政治空间关系，太史公完成了深层的从“夷夏不分”到“夷夏有别”，再到“夷夏一体”的话语建构，廓清了多元共生的民族一统发展格局。太史公撰《史记》上溯五帝三代之世，自有其“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气度，但更直接之用意当在“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太史公自序》）。在《伯夷列传》述尧、舜、禹禅让之际，太史公那种详计审处之苦心表露无遗：“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林立仁，2009）鉴于此，深受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影响的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首先把黄帝形象塑造成为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中华多元统一部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杜贵晨，2019），接着又细述尧舜治绩、巩固早期“大一统”，紧随其后是在《夏本纪》中叙大禹刊九州，在《秦始皇本纪》中描摹地理一统，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细述封土设郡、地缘边界，强化政治一统，在《货殖列传》中勾画经济地理、陈说货物流通，呈现人文一统。如此，再回首重读《五帝本纪》方知，本传潜隐了中国早期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等体系化的“大一统”思想，隐然藏有春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春秋公羊传》）之微言。

总结言之，《五帝本纪》为开宗明义之首章，为华夏几千年文明立下一个至高之义，成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进而塑造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文化形态。因此，华夏民族得以实现持续、强大的族群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 Bertrand Westphal 2011. *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translated by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蔡亚玮，2018，《史记·五帝本纪叙事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柴春椿，2021，《舜帝传说与信仰研究》，太原：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陈正宏，2020，《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书》，北京：中华书局。

³⁶ 关于陆贾“附远宁近，怀来万邦”的华夷近远论、贾谊的华夷上下论、董仲舒的华夷互变论、北宋石介的华夷内外论、《大义觉迷录》“一统论”的主要思想及其流变过程，请参阅：段超、高元武，2020，〈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5期，页1-8。

- 崔勇、魏隽如, 2012, 〈炎黄文化的发祥地——“涿鹿”与“阪泉”〉,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7卷5期, 页21-24。
- 大野圭介, 2006, 〈《史记·五帝本纪》浅析〉,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 页35-44。
- 杜贵晨, 2019, 〈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文史哲》, 第3期, 页139-164+168。
- 段超、高元武, 2020, 〈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0卷5期, 页1-8。
- 傅斯年, 2012,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高季乔、李建华, 2016, 〈论空间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空间性〉,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2卷1期, 页22-26。
- 葛剑雄、周筱赟, 2002, 《历史学是什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顾颉刚, 2010, 〈答刘胡两先生书〉,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卷1, 北京: 中华书局。
- 顾颉刚, 2011, 〈幾服〉, 顾洪编, 《顾颉刚读书笔记》, 卷十六, 北京: 中华书局。
- 顾颉刚、刘起釪, 2005, 《尚书校释译论》, 北京: 中华书局。
- 顾迁译注, 2009, 《淮南子》, 北京: 中华书局。
-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2012, 《左传》, 北京: 中华书局。
- 郭声波, 2020, 《史记地名族名词典》, 北京: 中华书局。
- 韩昇, 2023,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韩晓, 2006, 《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 上海: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汉]许慎, 2007, 《说文解字》, [宋]徐铉等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黄铭、曾亦译注, 2016, 《春秋公羊传》, 北京: 中华书局。
- 黄松筠, 2019, 〈华夷理论演变与中华民族形成〉, 《社会科学战线》, 第9期, 页143-149。
- 黄庭柏, 2010, 〈《史记》为何首列《五帝本纪》〉, 《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 第12期, 页21-23。
- 吉成名, 2017, 〈论黄帝身世和姓名〉,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1卷4期, 页158-161。
- 李凭, 2015,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华中国学》, 第1期, 页137-174。
- 李如东, 2023, 〈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 从李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反观亚欧民族学问题〉, 《西北民族研究》, 第3期, 页26-39。
- 李学勤主编, 1999, 〈春秋公羊传注疏〉,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卷八,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岗, 2010, 〈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7卷3期, 页47-56。
- 刘家和, 2005, 《史学、经学与思想: 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林立仁, 2009, 〈论《史记·五帝本纪》首黄帝之意义〉, 《人文社会学报》, 第5期, 页39-67。
- 刘如江, 2002, 〈轩辕黄帝出生在新郑〉, 《档案管理》, 第5期, 页44。
- 刘彦青, 2021, 〈重组的艺术与重构的记忆: 《五帝本纪》黄帝战争文本蠡测〉,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0卷1期, 页115-124。
- 龙迪勇, 2015, 《空间叙事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龙显昭, 2010, 〈颛顼出生地及相关史迹考论〉,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 页33-37。

- 卢元骏注译, 1979, 《说苑今注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陆玖译注, 2011, 《吕氏春秋》, 北京: 中华书局。
- 鲁西奇, 2014,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阮芝生, 1999, 〈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 《台大历史学报》, 第23期, 页1-59。
- 阮芝生, 2022, 《史记的读法》,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 钱穆, 2001, 《史记地名考》,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司马迁, 1959,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 孙庆伟, 2024, 〈《史记·五帝本纪》反映的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 《社会科学文摘》, 第1期, 页32-35。
- [清]孙星衍, 2003, 《尚书今古文注疏》, 陈抗、盛冬铃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北辰, 1994, 〈黄帝史迹涿鹿、阪泉、釜山考〉,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 页108-115+128。
- 王和, 2011, 《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奇伟, 2008, 〈读《史记·五帝本纪》论黄河中游早期国家形成的时间〉,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页9-15。
- 王文光、翟国强, 2005, 〈“五帝”世系与秦汉时期“华夷共祖”思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第3期, 页1-8+146。
- [五代]刘昫, 1975, 《旧唐书》(全16册), 第十二卷, 传六,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瑛, 2016, 〈空间叙事: 中国叙事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基点〉,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5卷3期, 页121-129。
- 徐军义, 2014, 〈《史记·五帝本纪》的主体性构建〉,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第29卷14期, 页8-13。
- 徐旭生, 2003,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中舒, 1998, 〈陈侯四器考释〉, 《历史论文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 许倬云, 2015, 《说中国》,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阎崇东, 2005, 〈史记史学研究〉, 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主编, 《史记研究集成》, 第八卷, 北京: 华文出版社。
- 杨化剑, 2020, 〈《五帝本纪》的天人空间研究〉,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第38卷6期, 页103-106。
- 杨燕起, 1996, 《〈史记〉的学术成就》,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燕起, 2015, 〈《史记》对国家大一统的称颂及内在逻辑〉, 《湖湘论坛》, 第5期, 页119-124。
-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 1986, 《历代名家评〈史记〉》,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大可, 2022, 〈《史记》如何彰显“大一统”历史观〉, 《中国民族》, 第10期, 页116-119。
- 周颖南, 1996, 〈中华文明始于涿鹿〉, 《民主》, 第11期, 页40。
- 邹逸麟, 2013,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